

华东师范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日本)日中文化研究会

Xinyazhou Wenming yu

Xiandaihua

东亚学研究

新亚洲文明 与 现代化

DONDYAXUE YANJIU

盛邦和 主编
井上聪

学林出版社

新亚文化研究系列
XIN YASUO WENMING YU XIANDAIHUA

Xin YASUO WENMING YU XIANDAIHUA

Xiandaihua

4000000

新亚洲文明 与 现代化

徐英瑾 主编
李正德 主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 ·

华东师范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日本)日中文化研究会

Xiandaihua

Xinyazhou Wenming yu

东亚学研究

新亚洲文明 与现代化

盛邦和 主编
井上聪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盛邦和,井上聪主编.—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3.6

(东亚学研究)

ISBN 7-80668-527-8

I.新... II.①盛...②井... III.①文化—研究—
东亚②现代化—研究—东亚 IV.①G131②D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5751 号

东亚学研究 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



主 编—— 盛邦和 井上聪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鲁继德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 话: 64515005 传 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 话: 64515012 传 真: 64844088
印 刷—— 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4万
版 次——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册
书 号—— ISBN 7-80668-527-8/K·19
定 价—— 19.00元

前 言

盛邦和

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特别是东亚现代化话题的论文集。本书作者关注的是亚洲、文明、现代化这三个关键词的内蕴和逻辑关联，既从宏观视野俯视整个亚洲与东亚的重大问题，又从微观视角剖析亚洲内部的有关方面，对亚洲文明与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之间的关系作了理论估测与现实关怀。

本书的逻辑构架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和宏观上对亚洲话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实为“亚洲总论”。它由一组七篇文章构成，体现本书趣旨。前两篇是本书的主题文章，作者以东亚为主要分析对象，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开展原型亚洲文明与新亚洲文明的比较，论证“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特质，叙述新亚洲文明特征及其前途命运。本组其他文章对“亚洲论述”、“亚洲民族主义”、“亚洲发展问题”、“东亚问题意识”、“亚洲中心论”等展开相关讨论。

第二部分是一组日本学者的文章，有井上聪、井上明芳、铃木吉维、本间直人等先生的中国学研究，还有臧世俊先生关于人民币与日元汇率变动问题的精深论述。

第三部分以“亚洲分论”的角度来看，未尝不可。本组文章从“中国史学现代性”、“中日关系的曲折与未来”、“朱谦之的日

本学研究”、“滨下武志的中国学研究”等方面对中日相关话题作了个案研究。

第四部分有东亚书院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和三篇与博士论文相关的文章。东亚书院关于“现代性”话题的讨论涉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普世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另,钱茂伟和张旗的两篇博士论文摘要和蒋连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新认识》也同样启人思维。

(笔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前言	盛邦和(1)
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	盛邦和(1)
东亚新文明与新文明区	雨田(34)
“亚洲论述”:历史与价值	章益国(52)
关于亚洲话题的讨论	
——是地域主义还是抵御主义	东亚书院(91)
从亚洲看发展问题	翟意安(102)
东亚概念及问题意识	杨贵言(116)
亚洲的路灯?抑或欧洲的路灯?	
——试论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 的著名论争	何爱国(140)
《古事记》所见阴阳五行	井上聪(167)
论横光利一的《上海》	

- 典型的都市小说…………… 井上明芳(184)
- 论芹泽光治良的《爱情·智慧·悲哀》…………… 铃木吉维(201)
- 近代日本一部值得一提的中国语教科书
- 浅论宫岛大八的《官话急就篇》
- …………… 王 凌 本间直人(209)
- 论人民币·日元汇率变动的问题…………… 臧世俊(229)
- 中国史学现代性演进的“四行程”与“三流派”
- …………… 东亚书院(260)
- 记忆的对话和中日关系的未来
- 关于“东史郎现象”的考察…………… 汪 平(265)
- 回忆、诉讼与思考
- 关于《东史郎日记》的影响及其研究状况
- …………… 汪 平(275)
- 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研究…………… 张国义(286)
- 发展问题的新思考
-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
- 与近代亚洲经济圈》读后…………… 雨 佳(300)
- “现代性”话语五人谈…………… 东亚书院(309)
- 《明代史学研究》提要…………… 钱茂伟(324)
-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史学嬗变》摘要…………… 张 旗(333)
- 文化民族主义的新认识…………… 蒋连华(336)

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

盛邦和

亚洲文明属于与欧洲文明不同的文明,具体又分成原型亚洲文明与新亚洲文明(太平洋亚洲文明),原型亚洲文明经现代化而成新亚洲文明。本文以东亚为主要分析对象,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开展原型亚洲文明与新亚洲文明比较,论证“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特质,叙述新亚洲文明特征及其前途命运。^①

上篇 原型亚洲文明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将人类生产方式分为“古典的”、“希腊·罗马的”、“亚细亚的”等几种,简言之,即“欧洲”类型和“亚洲”类型两种。^②是乃人类基本的对立与互动的生命体系。人类的生命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类主要的生命活动)总要受到环境的强迫、制约与影响。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创造与环境相适的特定的生命体系与生产方式的历史。文明本质而言,即人类的生

① 本文所说的亚洲主要指东亚。

② 马克思说:“在大体的轮廓上,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有产者的生产方式是可以表识为经济的社会结构之进展的各个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第4页。

命体系与生产方式。

一、文明与环境

(一)文明的定义和内容

文明可视为人类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构造及文化特点的总和。文明具有“总体系”的性格，“总体系”之下，又可分为如下四个“分体系”。

A 环境体系。大陆、海洋、温暖、寒冷是环境体系的四大基本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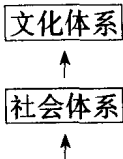
B 生产体系。人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和环境产生两种基本对应关系，即“人—土地”的对应关系和“人—海洋”的对应关系。如是基本对应关系，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即亚洲大陆型农业式生产体系和欧洲海洋型工商式生产体系，由此人类不同的文明体系也就此形成。

C 社会体系。人口、土地、市场、家庭、集团、政权、制度等是人类社会体系的基本要素。

D 文化体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伦理等是文化体系的基本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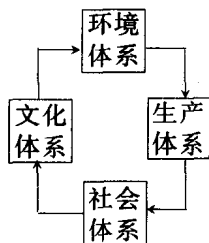
(二)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因果性、顺序性及循环性

文明形成具有因果性、顺序性及循环性的特点。一切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均为“环境”；从不同环境体系产生不同的生产体系；从不同生产体系产生不同的社会体系；最后从不同社会体系产生不同的文化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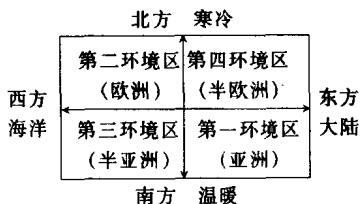




以上四个文明体系中,各下层体系必定是对应的上层体系的形成原因,各上层体系又是各下层体系作用的结果生成。文明四体系从运动方式来说,不仅有因果性、顺序性,还有循环性,下面的图形反映了这一循环的基本物象。



文明以循环的方式发展,这就决定世界各大文明都具有持久性。世界文明性质的差异与分野乃被文明运动方式的循环性与持久性决定,只要这样的循环性不被打破,文明的性质大体不变。在文明体系构造中,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描绘出世界环境分区的坐标,世界文明的坐标也就能确定。环境坐标与文明坐标,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关系。



上表既是世界环境的坐标,也是世界文明的坐标。

由上表可见,决定人类文明的环境要素有四个。其一为大陆,其二为海洋,其三为温暖,其四为寒冷。地球据其四要素分为四个环境区。

第一环境区:温暖的大陆区(如中国、印度、中东)。

第二环境区:寒冷的海洋区(如西欧)。

第三环境区:温暖的海洋区(如日本)。

第四环境区:寒冷的大陆区(如俄罗斯、东欧)。

(三)亚洲文明区与欧洲文明区

①第一环境区(中国等)和第二环境区(西欧等)是世界最主要的环境区,它们是世界文明的主要诞生地。

②第一区由“大陆”和“温暖”两个环境要素,创造亚洲文明。第二区由“海洋”和“寒冷”两个环境要素,形成欧洲文明。

(四)混合区:半欧洲文明区与半亚洲文明区

①寒冷大陆区(俄罗斯及东欧)一方面具有欧洲文明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具有亚洲文明的性质,可以说是“半欧洲”。

②温暖海洋区(以日本为典型),自古受海洋环境的刺激,工商业有所发展,“半亚洲”的特点很鲜明。^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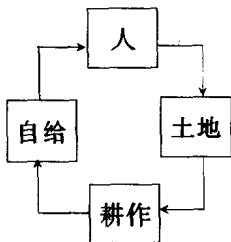
二、原型亚洲文明图解

文明体系的形成乃被人与环境的对应关系决定,对应关系的不同,形成人类文明体系的差异。在此,试分析亚洲大陆文明体系的特征(以中国为例)。亚洲大陆区,即典型的大陆区,人和

^① 参考拙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第一章,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在此书中作者将世界划分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两种文化。

环境的基本“对应关系”是“人—土地”之间的关系。这一对应关系从“人”出发，“人”依赖土地，通过利用土地与享用农产品维持生计。其关系特点是：人——土地——耕种——自给——人。

图形表明如下：



三、“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一)“人—土地自然法则”

亚洲社会中人一旦与土地结上关系，即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法则。我们将此法则称为“人—土地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土地的无节制倾泻”。

第一、人口“无节制增加”。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劳动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农业人口的增加绝无计划性，以“不可逆”的方式进展。

第二、土地的“无节制倾泻”。相对于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土地面积在绝对意义上，总保持不变的常量，土地的肥力也在不断减退中。然而，土地从来不会长期均等地配置在农民手中，总以“水往低处流”的形式快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所谓“土地兼并”。我们称之为“土地的无节制倾泻”。

“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土地的无节制倾泻”的并存、矛盾

与冲突,是“人一土地自然法则的”的基本含义。如此法则的存在,构成亚洲文明体系的基本物质原因。

(二)“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人一土地自然法则”的存在,使“亚洲文明体系圈”得以形成。这个体系圈以如下的顺序作循环往复的运动:

第一、“人口无节制增加”,人口激增,土地不增,土地肥力衰减,由此造成社会“人口超负荷”,导致流民剧增。

第二、“土地无节制倾泻”将更多的人口赶离土地,流民问题更趋严重。

第三、土地分配的均等性被打破,社会不均的现象日趋严重。流民产生。

第四、流民组合,成为威胁既成秩序的“脱秩序势力”与“暴力源”。中国历代多流民暴动,就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脱秩序势力”与“暴力源”。

第五、“流民群”与“脱秩序势力”增大,终于形成重大社会问题,流民暴动开始。

第六、流民暴动与近代市民革命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并非新生产力的产物,而是古老农业生产关系的特殊接续与修复方法。

第七、流民暴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其一,超负荷人口因战争而部分消除。其二,作为“土地倾泻”主体的豪农受到冲击,流民企求的“土地均分”在战争中被强制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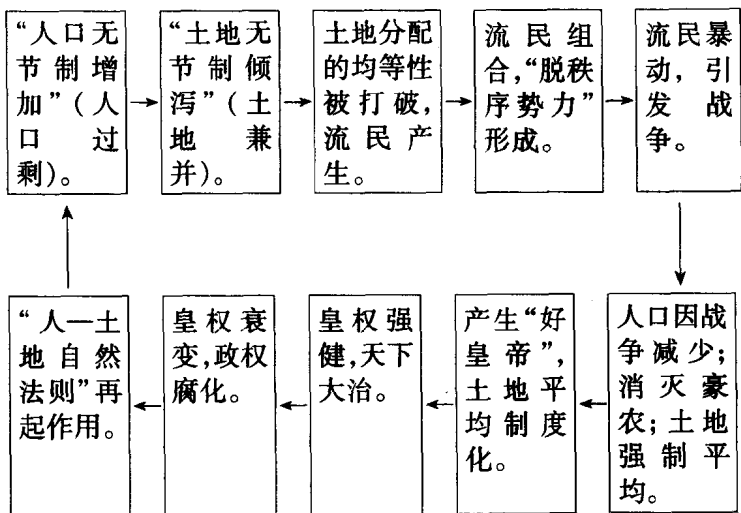
第八、作为流民暴动产生的广义社会结果,产生“好皇帝”,依靠新政府强权之手,推行均田制度,达成土地均分的制

度化。^① 人与土地的矛盾缓和,社会由乱而治。

第九、封建威权强健,出现“贞观之治”式的治理局面。

第十、威权衰变,政权腐败,“人—土地自然法则”再起作用,新一轮“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再行启动,社会再次动乱。

将以上“体系圈”作成图形如下:



^① 唐朝的繁荣与其公元624年实行均田租庸调法有关。基本内容是规定国家分给农民以永业田与口分田;田地可以买卖,但买田不可超过一定数额;农民按丁口向政府交纳租庸调。日本在624年也颁布《大化改新之诏》,将全国土地、人民收为“公地、公民”,规定农民可按人口分得“国分田”,死后由政府收回,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是所谓班田制。两国土地制度稍有出入,但目的都是依靠政府力量施行土地平均制度化,以使农民回到土地,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参考(日本)齐藤博:《日本经济史》,法学书院1981年版,第27页。

四、“亚洲文明体系圈”决定的“原型亚洲文明”特征

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伊朗等亚洲农业国家(第一环境区),都存在“亚洲文明体系圈”现象,其中中国“亚洲文明体系圈”尤其典型,由“亚洲文明体系圈”决定的“原型亚洲文明”特征也特别明显,表现如下:

(一)“平均—专制”的自然连锁

何以产生专制主义?这一问题长期来讨论很多。比如“水利说”认为亚洲大陆地区为利用河流灌溉,必须有一个专制政府。英国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则持“大陆中枢说”,称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在亚洲腹心地区,为防止周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入侵,创立军事集权与专制政权。^① 其实,关于中国专制主义发生的原因,有其独有的特点,“亚洲原型文明体系圈”及其作为主要特点的“平均—专制”的怪异连锁的存在是中国式大陆专制主义成立的最主要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社会动乱的初因是流民剧增与农民(流民)暴动。流民(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社会的动荡震源与暴力引媒,而究其起源,则在于农业社会的最大分配不公即土地不均。而使土地分配恢复平均的方式只有两个:流民暴动与皇权专制。土地不会自动回到农民手中,除农民暴力之外,皇权对土地分配的强制干预实为妙法。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缺少,当众多的“饥儿”围绕着一块有限的“蛋糕”(土地),争夺与暴力在所难免。“强壮的儿童”与“弱小的儿童”在“蛋糕争夺”中,后者总处于弱势,由此阶级产生,不平滋长,动乱

^① 麦金德:《历史的中枢》,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4页。英国H. J. 麦金德曾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1919年又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提出著名的“陆心说”理论。

益烈。这样,社会就必然呼唤一个“超然的强者”与“看得见的第三只手”,用超乎强者与弱者之外的超社会力量,安排“儿童”的秩序,决定“蛋糕”(土地)的均分;这第三种力量,无异就是皇权的力量。诚如福泽谕吉所说:“一国实行专制政治不一定是砖制君主和官员的过错,实际上国民……自己招致了这一不幸的政治。”专制主义实际上和农民有很大关系,可悲的农民祈望“土地的绝对平均”,结果总欢呼王权的复活与皇帝的再生。^①专制主义由此在农民的吁求中真理化、权威化与渗透化。皇帝崇拜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强势思维态势。^②“平均”必然抹杀“平等”。“平均”、“平等”不可共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合理社会中,“平等”是“机会均等”与人格平等,而在中国“经济平均”的社会,一切生活资料(如土地)都由皇帝授予,农民绝难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机会均等”,被视为“小民”,而失去“人格平等”。中世纪人民以承受经济、政治与文化专制的巨大代价,换取土地的平均、社会的安定与起码的生计。以“平等”换“平均”,为平均促专制,“平均”和“专制”成了“孪生子”,“平均—专制”的自然连锁由此而生。

(二)“停滞—‘石女’”的终极效应

尽管中国每次农民起义都开创新国家和新政府,但总体而

① 福泽谕吉:《劝学篇》,现代教养文库 1988 年版,第 32 页。

② 中国自秦汉以来乃为君主专制社会,但钱穆却“仍将不悛反覆对此问题做辩护”,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并无所谓专制,唯蒙元、满清两个政权可作专制论。其实专制在一个意义上是经济学的问题,也即依靠政府威权的“专有裁制”达到社会土地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封建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乃建立在土地分配的均衡之上。由此可看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必有性与必要性。钱穆论中国无专制,参见《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4 页。